

劳动力流动的原驱力： 技术进步

LAODONGLI LIUDONG DE
YUANQULI: JISHU JINBU

肖六亿 ·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第42批中国博士后基金资助
武汉大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项目
湖北师范学院出版著作基金资助

劳动力流动的原驱力： 技术进步

LAODONGLI LIUDONG DE
YUANQULI: JISHU JINBU

肖六亿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徐 凯
责任校对:王 冰
封面设计:翼虎书装
责任印制:李 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劳动力流动的原驱力:技术进步 / 肖六亿著.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7-5614-4215-9

I. 劳… II. 肖… III. 技术进步—影响—劳动力流动—
研究—中国 IV. F249.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97754 号

书名 劳动力流动的原驱力: 技术进步

著 者	肖六亿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4215-9
印 刷	成都蓉军广告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45 mm×210 mm
印 张	6.75
字 数	17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 001~1 000 册
定 价	20.00 元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
联系。电 话:85408408/85401670/
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网址:www.scupress.com.cn

内容简介

伴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和劳动力市场的完善，劳动力资源的配置程度越来越高。劳动力市场化配置过程表现为劳动力资源的流动。劳动力的长期大规模流动会给中国的经济、社会和生活带来短期冲击和长期影响。为了把握劳动力流动的规律，判断其发展的趋势，使之更好地满足经济发展阶段和社会生活的需要，笔者力图从市场运行的角度来探讨决定劳动力流动的深层次原因。

经济学是研究资源稀缺条件下的资源最优配置和高效使用的学科。劳动力是生产要素，所以，本书从经济学视角重新界定了劳动力流动。所谓劳动力流动，是指劳动力为了获得更高的劳动收入，而在地区间、产业间、部门间、就业状态间、企业间、甚至工作间的转移。根据新的劳动力流动定义，首先考察了具有一般性的发达国家劳动力流动的四种形式，接着具体分析中国的劳动力流动形式。中国的劳动力从不能流动到逐步流动，再到大范围、大规模流动，经历了一个转轨的过程。当前，中国劳动力的流动形式主要有五种：从农村流向城市，从经济落后地区流向经济发达地区，从国有单位流向非国有单位，在工作间流动，在产业间转移。在这五种流动形式中，最

突出的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跨地区劳动力流动，而劳动力在就业状态之间的转换和工作之间的转移没有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流动，都表现出共同的特征，即劳动力从低工资率流向高工资率。那么工资率与劳动力流动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两市场劳动力流动模型认为，劳动力市场细分为不同的子市场，各子市场之间不能实现一般均衡，因而各子市场的均衡工资率不同。劳动者作为理性经济人以追逐高工资率为目标，为了获取更高的工资率，劳动力便在不同的劳动力市场间流动。所以，工资率的差异是决定劳动力流动的直接原因。这个结论具有强大的理论和实证基础。因为，二元经济发展理论论证了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的决定因素是城乡收入差距；人力资本理论表明，地区间劳动力流动和工作间劳动力流动的决定因素分别是地区收入差距和工作间收入差距。产业理论也表明，产业间收入差距诱发了劳动力在产业间的流动。尽管中国劳动力流动形式有多种，但最引人注意的是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和跨地区流动。已有研究表明，这两种劳动力流动的诱发因素是城乡收入差距和地区收入差距。总之，已有的研究都将收入差距作为劳动力流动的终极因素。

但是，笔者认为，工资率差距是决定劳动力流动的直接力量，技术进步差异才是决定劳动力流动的终极因素。工资率差距与工资率持久变动决定于技术进步的差异。技术进步的内生性决定其是动态变化的，并且存在产业、部门和地区差异。所以，各个细分市场之间因技术进步的差异难以达到一般均衡。单一部门技术进步模型告诉我们，在单一部门情况下，技术进步提高了工资率，使其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由此引起劳动力在就业状态之间流动。两部门技术进步模型告诉我们，在两个部门技术进步速度不同的条件下，它们的市场工资率存在差异，从而使劳动力从技术进步率较低的部门流向技术进步率较

高的部门。

技术进步不仅诱导产业结构变迁，而且依托于一定的产业。技术进步的产业差异性引起劳动力在产业间的持久流动。产业布局必须依托一定的空间，因此，农村、城市和各个地区就成为产业依存的空间，城乡差距和地区间差距都是产业（部门）空间差异的反映。所以，城乡间和地区间劳动力流动都是产业间劳动力流动的空间依托形式。

通过考察三次产业间、地区间和所有制企业间的劳动生产率和工资率的变动情况，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变动能够很好地解释工资率的变动。这说明，中国劳动力流动的深层原因是技术进步。

总之，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经验上，我们可以将决定劳动力流动的深层原因从收入层面推进到技术进步层面。另外，本书的最后一部分归纳出前文分析的基本结论，并基于这些结论提出了一些政策性建议。

目 录

1. 导 论	(1)
1.1 问题的提出	(1)
1.2 研究现状评述	(7)
1.3 选题意义、文章结构与研究方法	(32)
1.4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37)
2. 劳动力流动及其形式	(39)
2.1 劳动力流动的含义	(39)
2.2 劳动力流动的一般形式	(50)
2.3 小结	(60)
3. 中国的劳动力流动	(62)
3.1 劳动力从不流动到流动	(63)
3.2 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	(66)
3.3 劳动力跨地区流动	(68)
3.4 劳动力在工作间的流动	(72)
3.5 劳动力在不同所有制企业间的流动	(76)

3.6 劳动力在产业间的流动	(82)
3.7 小结	(84)
4. 劳动力流动与市场工资率差距	(86)
4.1 劳动力流动的一般原因分析	(86)
4.2 两市场劳动力流动模型	(93)
4.3 城乡间的劳动力流动	(97)
4.4 跨地区的劳动力流动	(102)
4.5 工作间的劳动力流动	(104)
4.6 产业间的劳动力流动	(107)
4.7 中国劳动力流动的收入决定	(109)
4.8 小结	(112)
5. 市场工资率差别与技术进步	(114)
5.1 市场工资率差别的动态决定	(114)
5.2 技术进步的含义与类型	(117)
5.3 部门技术进步模型	(127)
5.4 小结	(132)
6. 技术进步与劳动力流动	(133)
6.1 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演进	(133)
6.2 地区差别、城乡差别都是产业差别的外在表现	(140)
6.3 小结	(145)
7. 技术进步与中国的劳动力流动	(146)
7.1 技术进步与劳动生产率	(147)
7.2 技术进步、产业发展与工资差异	(149)
7.3 技术进步、地区经济差距与工资差异	(156)
7.4 技术进步、不同所有制企业与工资差异	(161)

7.5 小结	(167)
8. 结论与政策建议	(168)
8.1 基本结论	(168)
8.2 政策建议	(174)
参考文献(中文)	(188)
参考文献(英文)	(199)

1. 导 论

1.1 问题的提出

伴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资源配置方式由行政配置转变为市场调节，市场化改革在中国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就劳动力资源配置来说，已经破除了传统的劳动力非商品的观念和“一配定终身”的就业制度，市场机制已经主导了劳动力的配置过程。随着劳动力市场的日益成熟和完善，劳动力流动迅猛发展，流动形式丰富多样，不再简单地表现为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和跨地区转移这些原始的流动方式，而展现出在多层次、多角度同时流动的生动图景。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特点是通过发展乡镇企业与建设小城镇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由此引发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何处去”的大讨论。这一时期兴起的“民工潮”激起了“对‘盲流’的抑制还是鼓励、规范管理”的大讨论。80年代后期，部分民工“回流”，于是诱发了是否要依靠“回乡创业”带动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建设的讨论。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民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而民工外地就业的工资收入始终没有增加，因此，2004年，在“珠三角”和“长三

角”开始出现了“民工荒”、“技工荒”。这次关于“民工荒”的讨论方至今兴未艾。姑且不评论这些讨论，仅从“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发展到“民工荒”的历程来看，就可以串起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的历史画卷。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一个长期的战略问题，它与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密切相关。

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主导了中国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模式，除此之外，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也格外引人注目。伴随着“民工潮”和市场经济的勃兴，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兴起了“孔雀东南飞”的中西部地区的知识人才、管理人员、技工人员和毕业大学生纷纷流向东部沿海地区就业的热潮。在这一热潮的推动下，“民工潮”已突破了本省的地域限制，演变为全国性的流动，民工的流动方向已经具有双重性：从农村流向城市、从中西部流向东南沿海。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引发了资金、技术和人力资本向东部沿海地区的聚集，从而加速了产业集中，并进而拉大了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因此，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一直是专家学者们研究的热点和政府决策者关心的大事。

除了这两种备受关注的劳动力流动的典型形式之外，中国的劳动力流动还出现了其他表现形式。20世纪90年代的国有企业劳动用工制度改革，以及后来的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分流式的“脱困改革”，迫使失业工人不得不另谋生路，要么“自我雇佣”，要么转移到非国有企业就业。与此同时，受到“孔雀东南飞”的启发，国有企业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也纷纷流向三资企业和民营企业，于是出现了国有企业“人才流失”的现象，非国有企业成为中国劳动力就业的主要阵地。

劳动力除了从国有单位转向非国有单位就业外，其在企业间或工作间的流动可以表现为在相同所有制企业内部的流动。劳动力在工作间的流动，我们习惯称之为“跳槽”。20世纪90

年代初期，跳槽现象极为罕见，到了现在则非常普遍。最早跳槽的人是企业管理人员、市场经理人和技工人员等具有一定人力资本的劳动力，如今“跳槽”成了普通民工的常态。

中国当前出现的形式多样的劳动力流动形式，对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冲击效应，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

(1) 从“民工潮”发展的艰辛历程到现在丰富多彩的劳动力流动画面，显示出一切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度终将退出历史舞台，折射出中国劳动力市场从无到有、从分割到统一的规律，也反映出中国的就业制度从行政计划配置成功转变为市场机制调节。总之，市场化取向的改革为中国劳动力流动提供了制度保障和市场动力。

(2) 在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上，许多矛盾需要解决，许多问题需要解释。这些劳动力流动方式在中国劳动力市场上交织在一起，勾画出一幅动态就业图景：“民工荒”与“大学生就业难”同时出现，到底意味着什么？对国有企业“人才流失”、“智力外流”，外资企业高薪“招兵买马”，吸引高素质人才，又该如何看待？中西部地区留守人员老龄化，以及由此造成的对农业和地区差距的冲击，该怎么办？劳动力高频率转换工作和跳槽说明什么？这一图景是以劳动力的流动为线索勾勒出来的。可见，劳动力流动以其神奇的魅力吸引着人们去研究它。

(3) 劳动力流动的内容非常丰富，因此，不可能对它作系统、全面的研究。劳动力流动从单一形式向多元化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制度的变迁和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但是我们发现，中国劳动力流动具有非常明显的单一的方向性，从农村到城市、从中西部到东南沿海、从国有单位到非国有单位，以及从一个工作到另一工作的“跳槽”，最终都表现为从低收入流向高收入。这种流向表明，只要收入差距存在，劳动力流动就是必然的，制度变迁只是开启了劳动力流动的闸门而已。也就

是说，劳动收入差距是劳动力流动的动力机制。那么是什么因素造成了地区间、城乡间、不同企业间、工作间和产业间的劳动收入差距呢？导致它们的劳动收入差距的因素有很多，对此众说纷纭。是否存在一种力量同时决定和影响地区间、城乡间、不同企业间、工作间和产业间的劳动收入差距呢？这就是本书所要探讨的中心问题。

(4) 自20世纪中期兴起的以微电子技术和信息网络技术为核心主导技术，以生命科学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空间技术、海洋技术、环境技术和管理技术为主导技术群的科技革命，协同金融创新和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而形成了“新经济”。新经济的发展迅速提高了劳动需求的速度，加速了劳动力的流动，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1978年以来，中国不仅经历了制度变迁，而且也获得了巨大的技术进步。技术进步与收入增长和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主流经济学的研究主题。因此，技术进步能否解释劳动收入差距，从而解释所有的劳动力流动，就是承接前述问题的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资本积累只有水平效应没有增长效应，只有技术进步可以解释人均产出随时间持久增长和人均产出的地区差异。新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内生化的，进一步揭示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率和地区经济差距的贡献。因此，技术进步不仅导致了横向上国家之间、国家内部的经济差距，而且带来纵向上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转变。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差距因发达国家主导着技术创新和发明而呈扩大之势，即使是发展中国家内部各地区也因技术水平差异而使其经济增长率的速度也不同，由此导致了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的地区差别。1991年，世界银行考察分析了1960年至1987年间68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因素。其研究结果如表1.1所示，主要分析结论是，发展中国

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属于高投入、高效率、高产出的经济增长型，技术进步起着重要的作用，如东亚地区；一类是高投入、低效率、低增长的类型，技术进步所起的作用极其微弱，如非洲、拉美国家。技术进步不仅可以解释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而且可以解释世界经济增长率和一国经济增长率的纵向提高。

表 1.1 68 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因素分析(1960—1987)

(单位:%)

地区与指标	GDP 增长率	资本投入 增长率	劳动投入 增长率	全要素生产 率增长率
非洲	3.3	6.3	2.2	0
东亚	6.8	10.2	2.6	1.9
中东、南欧、北非	5	7.6	1.7	1.4
拉美	3.6	6.3	2.6	0
南亚	4.4	7.7	2.1	0.6
68 个国家	4.2	7.2	2.3	0.6

资料来源：《1991 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 年版，第 43 页。

李京文和郑友敬等（1993）运用乔根森的方法实证测度了中国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的作用，研究结果见表1.2。由表1.2可知，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生产率增长的贡献是负值，表明这期间要素投入增长大于产出增长，是典型的投入型经济增长。改革开放之后，生产率的增长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则是非常显著的。因而可以认定，这段时期技术进步在我国的经济增长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表 1.2 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1953—1995)

(单位:%)

时间与项目	产出增长率	资本投入增长率	劳动投入增长率	生产率	
				增长率	贡献
1953—1978	5.92	10.23	2.63	-0.8	
1977—1990	11.29	10.54	2.81	4.7	41.63
1991—1995	11.94	12.37	2.27	4.65	38.9

资料来源：李京文、D·乔根森等，《生产率与中日美经济增长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姜钧露主编：《经济增长中科技进步作用测算》，中国计划出版社，1998年版。

技术进步引致的经济增长率的提高、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地区经济差距的扩大都会增强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为了提高生产率，要么节约投入，要么提高投入的单位产出。投入的节约使要素在使用与不使用之间流动，投入的单位产出的提高增加了要素收入，使要素从低收入流向高收入。产业结构变动诱使生产要素从传统部门向新兴部门流动，从“夕阳”产业向“朝阳”产业流动。地区经济差距决定着地区要素的收入水平，因此，生产要素趋于向经济发达地区聚集。经济全球化驱动生产要素的流动超越国界。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劳动力都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因为其既是生产要素又是生产的目的。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技术进步对劳动力流动性的影响日益显著。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劳动力最丰富、剩余劳动力最多、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发展中的大国，要通过科技创新来实现经济平稳、高速、持续增长，而技术进步对劳动力这种特殊的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就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总之，劳动力流动是中国的事实，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技术进步是否也是劳动力流动的动力源泉呢？这是

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1.2 研究现状评述

1.2.1. 国外研究

国外学者对劳动力流动从流动形式到流动的动因进行了全面分析。劳动力流动形式包括：劳动力就业状态的变化，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劳动力与工作的匹配过程，劳动力在产业间的转移，以及劳动力在工作间或雇主间的流动。

(1) 劳动力就业状态的变化。按照 Blanchard (2001) 的观点，总人口分为两部分，一是社会公共机构的平民人口，包括低于劳动力年龄、军队服役和监狱服刑的人员；二是非社会公共机构的平民人口。劳动力是非社会公共机构平民人口中的一部分，劳动力中的一部分是就业者，另一部分是失业者。因此，非社会公共机构的平民人口可以在劳动力与非劳动力之间流动，也可以在就业与失业之间游离。美国劳动力市场间主要有以下四种流动形式^①：① 由于自愿辞职或被解雇（非自愿地、暂时或永久地离开企业），就业者变成失业者；② 失业者由于新近被雇佣或者被召回原岗位，失业者变成就业者；③ 无论是就业者还是失业者，由于退休或决定不再承担或不再寻求有报酬的工作（中途退出），劳动力变成非劳动力；④ 由于以前从未工作或从未求职过的人的进入，或者由于中途辞职者的重新加入，劳动力的数量扩大了。劳动力的这种流动与劳动者工资收入在总收入中占的比例以及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有关。如果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并且工资收入不是主要的收入来源，劳动者则倾向于失业或退出劳动力市场。

(2)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研

① [美] 伊兰伯格，史密斯：《现代劳动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

究有多种理论，其中较有影响的有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费景汉—拉尼斯模型、托达罗模型、舒尔茨人力资本投资模型、斯塔克相对经济地位变化假说等。它们都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侧重于分析经济因素在人口迁移中的作用。刘易斯 (Lewis, 1954) 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农村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和隐性失业，农业中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几乎等于零或为负值，农村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流出不会对农业产出带来负面影响，反而会使留在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不断提高；随着城市中劳动力数量的不断增加，城市工资水平开始下降，直至城市部门的工资水平与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相当，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才会停止。农村部门和城市部门实际工资差异是劳动力流动的驱动力。费景汉—拉尼斯模型 (Fei and Ranis, 1961) 以刘易斯模型为基础，但与刘易斯模型不同的是，他们首次将农业部门的发展结合进来，构成了包含工业部门与农业部门发展在内的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劳动力流动模型。在他们看来，农业部门不仅像刘易斯所指出的那样能够为工业部门的扩张提供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同时，农业部门还可以为工业部门提供农产品的支持，即农业剩余。费景汉和拉尼斯认为决定农业剩余大小的因素有两个：一是农业部门的农业生产率，二是农业部门的劳动力总量。当农业部门中的劳动力总量在随工业部门扩张而渐渐减少时，如何保持和提高农业剩余的关键就在于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上。而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本身就是农业部门自身发展最显著的表现。在托达罗 (Todaro, 1969) 的两部门模型分析中，农村人口和劳动力的迁移取决于城市的工资水平和就业概率，当城市的预期收入水平和农村的工资水平相当时，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分配和迁移都达到均衡。由于城市经济存在着现代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之分，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首先进入非正规部门，然后才进入正规部门就业。因此，城市的预期收入是